

先南征，後北伐：宋初統一全國的唯一戰略 (960-976)？

梁偉基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引言

顯德七年(960)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藉陳橋兵變篡奪後周政權，建立宋王朝，史稱宋太祖。立國以後，太祖繼承周世宗的統一政策。他需要制定有效的統一戰略，繼續執行周世宗的政策。自宋代開始，不少學者已開始探討宋初統一戰略的問題。¹ 他們的意見可析為兩派：(一)以宋人陸游、清人王夫之及全祖望為代表，² 認為宋初實行「先南後

¹ 關於「戰略」這個用詞的界定，十八世紀法國人梅齊樂(Paul Gideon Joly de Maizeroy)在其《戰爭理論》(*Theorie de la guerre*)中率先提出「戰略」一詞，並定義為「作戰指導」。以後，許多戰略學者均對「戰略」一詞作出不同的解釋，如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李德哈德(B. H. Liddell-Hart)、薄富爾(André Beaufre)等。他們基本上把「戰略」的定義局限在軍事範圍以內，是一種傳統的解釋(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頁11-22)。而Edward N. Luttwak則把「戰略」析為五個層次，分別為技術(technical level)、戰術(tactic level)、戰役(operational level)、戰區戰略(theater strategy)及大戰略(grand strategy)，就是此五個層次構成一個確定的等級(Edward N.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69-70)。本文研究的範圍，即屬於Edward N. Luttwak所建構的最高層次——大戰略。古代中國雖然沒有「戰略」一詞，卻存在戰略的觀念，例如《孫子》一書即屬於戰略思想著作。「戰略」一詞大概在晚清時期從日本人那裏引進而來(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頁14-15)。

² 陸游：《渭南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卷二十五〈書通鑑後〉，頁3-4；王夫之(撰)、舒士彥(點校)：《讀通鑑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三十〈五代下〉，頁939；全祖望：《鮚埼亭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外編卷三十七〈周世宗論〉，頁1198。

北」戰略是錯誤的，導致宋人無法收復十六州之地³（五）以宋人王稱、呂本中、明人陳邦瞻為代表，⁴ 認為宋初實行「先南後北」戰略是正確的。⁵ 這個討論範疇，被延續下去。1949年後，普及的通史著作亦多吸收「先南後北」的戰略，解釋宋初的統一戰爭。⁶ 同時，學者對此課題的專門討論，與宋明清三代學者並無兩樣，均有一個為各人所認同的範疇，就是宋初的而且確實行「先南後北」的戰略，執行其統一政策。他們在「先南後北」的範疇內同樣地分為兩種意見：一種為批判，認為「先南後北」的戰略，導致宋人無法收復十六州之地；一種為支持，認為「先南後北」是適應當時情勢的，並形成一場論戰，其關注點圍繞宋初「先南後北」的戰略是對呢？還是錯呢？大陸學者對此課題的討論是繼承自宋明清三代學者的討論範疇。他們在「先南後北」的戰略得失方面縱使存在著分歧，但均承認宋初以「先南後北」的戰略，作為開展統一戰爭的藍圖。爭論焦點主要集中在「先南後北」戰略是否適當的選擇而已。⁷ 有些學者認為「先南後北」戰略是合理的，其論據不外四方面：（一）宋政權建立初期，內部形勢仍未穩定；（二）契丹力量遠在宋政權之上；（三）南方經濟物資充裕，正好作為北伐資本；（四）總

³ 按本文所謂十六州，即我們常稱的燕雲十六州。所謂燕雲是北宋末年徽宗為配合聯金滅遼的政策，乃先行設立燕山府路及雲中府路，作為將來取回故土的行政區，則北宋初年是沒有燕雲十六州的概念，故本文採用十六州之名。關於燕雲十六州的問題，可參考趙鐵寒：〈燕雲十六州的地理分析〉，載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宋遼金史研究論集》（臺北：大陸雜誌社，1960年），頁53-62。

⁴ 王稱：《東都事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卷二十三〈孟昶等傳〉，頁10。按《東都事略》的作者究竟是王稱呢？還是王偁呢？清代陸心源在《儀顧堂藏書續跋》卷七中指出他曾見過南宋光宗刊本和明代影宋覆刻本的《東都事略》，均從禾作稱。又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引錢綺《東都事略校勘記》云：「按《說文》禾部之稱解作銓，人部之偁解作揚。今王稱字季平，取銓衡之義，自當從禾。」又陳垣曾見到過《學海類編》所收輯自《東都事略》的西夏事略及張邦昌事略，都題作王稱而非王偁（見趙鐵寒：〈東都事略題端〉，載《東都事略》，頁4-50），故筆者亦作王稱；不著撰人：《宋史全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宋太祖二〉，頁7；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十二〈平北漢〉，頁77。

⁵ 關於宋明清三代學者討論宋初統一戰略問題的情況，乃參考張其凡：《趙普評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頁119-20。

⁶ 例如蔡美彪等：《中國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五冊，頁8；張傳璽（主編）：《中國古代史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下冊，頁15；邱樹森、陳振江（主編）：《新編中國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冊，頁227-28；及洪煥椿：《中國小通史：宋遼夏金》（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年），頁9。

⁷ 除歷史學者以外，一些戰略學家亦認為宋初實行「先南後北」的統一戰略，例如臺灣的鈕先鍾即以爲「宋太祖在開國時，聽趙普之謀作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決定，那就是採取先南後北的統一作戰」（鈕先鍾：《歷史與戰略：中西軍事史新論》（臺北：麥田出版股分有限公事，1997年），頁112）。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結並繼承後周戰略。反對一方，則認為此戰略改變周世宗「先北後南」的戰略，導致無法收復十六州之地。前者就戰前兩國力量的總體評估，如經濟、軍事等因素作為戰略產生的考慮；後者則有臆測的成分，他們的假設根本沒有發生，難以作出評估。另外，「先南後北」的「北」是否包括十六州之地？周世宗的戰略是「先南後北」？還是「先北後南」？太祖是否繼承周世宗的戰略等問題亦是爭論的重要部分。需要指出的是令學者相信宋初統一戰略是「先南後北」的重要證據，就是「雪夜訪普」的發生。他們認為太祖於統一戰爭開始以前，於某雪夜私訪趙普，商議宋初統一戰略的制定。結果，太祖為趙普「先南後北」戰略所說服，遂以此為完成統一政策的作戰指導。但是，很少學者對此事的發生年分作出詳細分析，多以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錄為準則。筆者將於下一部分對「雪夜訪普」的發生年分作出考訂，並有新的發現。

「雪夜訪普」：關於其發生年分的爭議

清初錢謙益〈雪夜訪普圖贊〉云

六花蔽天，六飛擁戶。君臣主賓，夫婦酒脯。杯盤江山，七箸疆宇。命將出車，削平下土。鼻鼾旋息。帝羝已腐。蠹爾契丹，誰予敢侮？雪霽日出，萬國有主。偉矣書生！韓王趙普。⁸

唐末五代以來，「朝廷多故，諸侯專制，兵革亂常」，且「僭偽未平，師旅未備，餘風未殄」，上述問題得以解決，「皆其〔趙普〕功也」，⁹可見趙普在宋初內政外交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在統一戰略方面，許多學者均視趙普為宋初統一戰略的奠基者。如張其凡肯定「〔雪夜訪普〕決定了先南後北的戰略」，韓國磐亦以為「趙匡胤取得政權，又聽從趙普的話，要先削平〔南方〕諸國」，日本學者竺沙雅章同樣認為「先南後北的統一政策，就是這樣〔夜訪趙普〕制定的」。¹⁰若能考訂出「雪夜訪普」的發生年分，對研究宋初統一戰略具有重要意義。就筆者所見，「雪夜訪普」的最早記錄，出於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簡稱《聞見錄》）。今錄其原文如下：

⁸ 錢謙益（撰）、錢增（箋注）、錢仲聯（標點）：《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二〈雪夜訪趙普圖贊〉，頁1432。另外，王禹偁撰有〈太師中書令魏國公冊曾尚書令封真定王趙公普挽詩〉十首（王禹偁：《小畜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太師中書令魏國公冊曾尚書令封真定王趙公普挽詩〉，頁7-9）。

⁹ 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趙中令公普神道碑〉，頁3。

¹⁰ 張其凡：《趙普評傳》，頁111；韓國磐：《柴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頁61；竺沙雅章（著）、方建新（譯）：《宋太祖與宋太宗》（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頁97-98。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嘿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陸對，彬辭才力不迨，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敢。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¹¹

明顯地，「遂定下江南之議」一語道出「雪夜訪普」發生於開寶七年(974)九月太祖用兵南唐前夕。後來，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簡稱《長編》)的時候，其史料來源，即出於《聞見錄》。今錄其原文如下：

上自即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謂上不復出矣，久之，聞扣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上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嘿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荆、湖，繼取西川。¹²

¹¹ 邵伯溫(撰)、李劍雄等(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一，頁4-5。現在，學者已開始對宋人的筆記小說作出研究，如張暉的《宋代筆記研究》對兩宋的筆者小說作綜合性研究，但至今沒有學者對《聞見錄》作出獨立的研究。

¹²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九，頁204-5。

按李燾沒有明言「雪夜訪普」的發生年分，只把它繫於開寶元年(968)秋七月。¹³ 然而，他認為太祖有「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的感歎，則當時尚未用兵荆湖。同時，他糾正《聞見錄》部分錯誤的記錄：(一)太宗在開寶六年(973)被封為晉王，故《聞見錄》記錄太祖稱呼太宗為晉王，是不合情理的，於是改為「吾弟」；(二)將「已而太宗至」，修改為「已而開封尹光義至」；(三)將「始定下江南之議」，改為「於是用師荆湖，繼取西川」。則他認為「雪夜訪普」發生於建隆二年(961)秋七月太宗出任開封尹至乾德元年(963)春正月太祖遣慕容延釗等用兵荆湖期間。根據李燾修改後的發生年分有兩個可能性：建隆二年或三年(962)。

現在，學者引用「雪夜訪普」的時候，多以上述《長編》記錄為準，少有引用其他相關的記錄。如張其凡的《趙普評傳》，即引用《長編》關於此事的記錄。張氏憑「上自即位」、「一榻之外」的言詞，斷定此事發生於平定李重進之亂後不久，¹⁴ 即建隆元年(960)冬天。雖然張氏引用《長編》的記錄，但卻作出一些修改，以致發生時間比《長編》早了一年以至兩年。因此，他在書中稱呼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而不稱呼他為開封尹。¹⁵ 因為早在建隆元年正月，光義即出任殿前都虞候一職。同時，按《長編》只云「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而已，¹⁶ 但張氏卻云「趙普的妻子和氏行酒，太祖呼之為嫂」，¹⁷ 則他何以如此確定替趙普等人行酒的為和氏呢？明顯地，他參考了《東都事略》中「普妻和氏行酒，太祖以嫂呼之」的記錄。¹⁸ 又伍伯常認為「趙普在國初為太祖親信，太祖諮詢臣下，當以趙普為先，決不致落後於張永德之後，且統一步驟乃刻不容緩之事，太祖似無理由捨棄在京之趙普而俟藩帥入朝，故太祖幸普第當在張永德入朝之前」，¹⁹ 則伍氏認為太祖夜訪趙普的時間為建隆元年某下雪月分。

¹³ 伍伯常認為繫於此年此月，實「為行文方便而作追述」而已，因為秋七月的汴京在氣候上言，是不應有大雪的(伍伯常：《中唐迄五代之戰略傳統與北宋之統一戰略》，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歷史學部碩士論文，1986年，頁649)。

¹⁴ 張其凡：《趙普評傳》，頁111。按太祖嘗好私訪大臣，為臣下以安全理由諫止，他卻說：「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一，頁4-5)仍繼續私訪的習慣。例如開寶三年(970)趙普病倒，太祖即「幸其第撫問之，賜賚加等」(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百五十六〈趙普傳〉，頁8933)；開寶六年(973)吳越國主錢俶遣使致書趙普，並贈送海物十瓶，適太祖私訪其第，普來不及收起十瓶海物，為太祖所見，打開一看，全為金瓜子，嚇得趙普連忙說，「臣未發書，實不知」，以免引起太祖疑慮(《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趙普傳〉，頁8933)，可見太祖晚年仍保持這種神經質的行徑。

¹⁵ 張其凡：《趙普評傳》，頁111。

¹⁶ 《長編》，卷九，頁205。

¹⁷ 張其凡：《趙普評傳》，頁111。

¹⁸ 《東都事略》卷二十六〈趙普傳〉，頁3。

¹⁹ 伍伯常：《中唐迄五代之戰略傳統與北宋之統一戰略》，頁651-53。

長期以來，學者很少懷疑《長編》關於「雪夜訪普」的記錄，最多以其為基礎作出一些修正而已。但是，其解釋又未能完滿地推斷出「雪夜訪普」的正確年分。筆者認為不妨從其他史料來源作一些對比，或許有新的發現。比《長編》成書略遲一點的《東都事略》亦有記錄此事，或能補充李燾記錄不足的地方。²⁰ 今錄其原文如下：

太祖嘗夜幸普第，立風雪中。普惶恐出迎，太祖與普飲于堂中，設重褥地坐，熾炭燒肉，普妻和氏行酒，太祖以嬖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太祖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矣，願聞成筭所嚮。」太祖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太祖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矣。」太祖笑曰：「吾意正如此，特以試卿爾。」因謂普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薦曹彬、潘美可用。其後，太祖征嶺南用潘美，伐江南任曹彬，而二國悉平。²¹

關於《東都事略》的取材問題，至今仍未見有很專門和深入的討論。²² 但是與《聞見錄》很接近，或出於《聞見錄》。如果把它和《長編》對照起來，則發現兩者不同的地方。²³ 因為李燾認為「雪夜訪普」發生於用兵荆湖以前，所以認為《聞見錄》「遂定

²⁰ 趙鐵寒認為《東都事略》比《長編》為早出，因後者引用前者的次數在太祖一朝的十七卷中已經有九處之多（趙鐵寒：〈《東都事略》題端〉，載《東都事略》，頁2）。但是，裴汝誠、許沛藻則認為《長編》比《東都事略》為早出。因為王稱的《東都事略》是於淳熙十三年（1186）上進朝廷的，但李燾早在淳熙十一年（1184）即已病逝。他根本沒有機會參考此書。《長編》注文引用《東都事略》的部分，是後人附會上去的（裴汝誠、許沛藻：《續資治通鑑長編考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88）。蔡崇榜亦持此說（蔡崇榜：〈宋代四川史學家王稱與《東都事略》〉，《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985年第2期，頁23-9）。

²¹ 《東都事略》卷二十六〈趙普傳〉，頁3-4。據《辭源》的解釋，嬖與媼是意思一致的。如《古文苑·漢鄼炎遺令書》云：「加供養謝媼，以老母相託。」（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辭源（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上冊，頁754）

²² 就筆者所見，研究《東都事略》的論文只有三篇，分別為陳述：〈東都事略王賞稱父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1分（1939年），頁129-38；何忠禮：〈王稱和他的《東都事略》〉，載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編）：《陳樂素教授（九十）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49-68；及蔡崇榜：〈宋代四川史學家王稱與《東都事略》〉，《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985年第2期，頁23-29。

²³ 按《長編》與《東都事略》記錄「雪夜訪普」的相異之處，還見之於太宗有否出席此次秘密會議的問題。根據《東都事略》的記錄，完全沒有提及太宗的出現，與《長編》等記錄全然不同。接宋太宗御制的〈趙中令公普神道碑〉的記錄，高度評價趙普在平定二李之亂所發揮的作用。然而，關於太祖夜訪趙普的事情，則隻字不提（分見《名臣碑傳琬琰集》卷一〈趙中

[下轉頁79]

下江南之議」有誤。但是，按照《東都事略》上述行文來看，太祖與趙普討論完統一戰略後，立刻討論用兵南漢、南唐的主帥問題。如此，則「雪夜訪普」的發生時間比《長編》記錄遲許多；比《聞見錄》又早了約四年，大約為平定後蜀至用兵南漢以前，即乾德三年(965)正月至開寶三年(970)九月期間。因為趙普在開寶六年(973)八月被罷相，所以李燾否定有趙普薦將的事。²⁴ 按趙普外放是開寶六年的事情，而太祖出兵南漢、南唐分別為開寶三年及七年(974)，則用兵南漢之時，趙普仍位處權力中樞，為太祖所信任。即使趙普被罷，太祖仍接受趙普意見，以曹彬為用兵南唐的主帥，也可以解釋過去。清人畢沅撰《續資治通鑑》的時候，即提出疑問，何以李燾認為其時「猶未平荆湖也」，仍將此事繫於開寶元年(968)呢？更引上述《東都事略》為證，認為「太祖方以王全斌多殺為慮，普因薦曹彬、潘美。正開寶元年事也」。²⁵ 於是，他肯定地指出「雪夜訪普」發生於開寶元年，則此又為一說。

《東都事略》的記錄為我們提供重要的線索，考訂出「雪夜訪普」的發生年分。我們不妨從整件事中，完全不重要的人物著手，就是替太祖等人行酒的趙普妻子。按《聞見錄》及《長編》均沒有提及趙普妻子姓甚名誰，而《東都事略》則清楚地說明為和氏。那麼，我們先要弄清趙普一些婚姻背景。按南宋李心傳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收有《趙韓王六世小譜》，記錄趙普有三位妻子，分別為衛國夫人魏氏，生有長子承宗、齊國夫人魏氏，生有次子承煦及《東都事略》提及替太祖等人行酒的陳國夫人和氏，生有二女。²⁶ 張其凡根據此譜再配合其他史料，對其婚姻背景有較深入分析。第一任妻子魏氏，出身鎮州豪族，於後周廣順元年(951)生下長子承宗，她大約於宋政權成立前後去世；第二任妻子亦姓魏氏，背景資料不詳，於乾德二年(964)生下次子承煦；第三任妻子和氏，為後晉宰相和凝的女兒。《東都事略》提及的和氏，應為趙普第三任妻子。按趙普次子承煦出生於乾德二年，則其時趙普的妻子仍為魏氏。而據張其凡考證，和氏至遲於開寶元年(968)即已嫁給趙普。²⁷ 很明顯，《東都事略》給予我們很重要的信息，即「雪夜訪普」發生的時候，和氏已嫁給趙普為妻。魏氏於乾德二年

[上接頁78]

令公普神道碑》，頁3；李攸：《宋朝事實》〔臺北：廣文書局，1980年〕，卷三〈御制〉，頁41-7)。是太宗知而故意不提，還是他對此事一無所知呢？當另文再作詳細討論。另外，南宋末年許月卿著有《百官箴》一書，記錄雪夜訪普一事，亦沒有提及太宗的出現(許月卿：《百官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留守箴〉，頁10)。

²⁴ 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之一，頁21；《長編》，卷十五，頁324。

²⁵ 畢沅：《續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五〈宋紀五〉，頁113-14。

²⁶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適園叢書》本(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7年)，乙集卷十二〈雜事·趙韓王六世小譜〉，頁1-2。

²⁷ 張其凡：《趙普評傳》，頁8，111。

生下承煦後難產，或不久因其他原因去世，過了一段時間趙普再取和氏為妻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如此，「雪夜訪普」的發生年分不可能早於乾德二年以前，則有幾個可能性：乾德二年、三年(965)、四年(966)、五年(967)、開寶元年及二年(969)。

除此以外，我們可以從一些旁證，藉以補充《東都事略》的記錄。首先，《聞見錄》、《長編》及《東都事略》記錄此事存在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當時正下著大雪，則此又為另一條重要線索。據《宋史·五行志》記錄，太祖年間無雪的記錄共有四年，分別為乾德二年(964)、五年(967)、開寶元年(968)及二年(969)。²⁸ 據此，我們可以刪減上述的諸可能性，只餘下乾德三年(965)、四年(966)。其次，太祖在乾德三年巧妙地亦表現出欲用兵北漢的態度。《長編》記錄乾德三年六月蜀主孟昶卒於開封後，即追述孟昶母親李氏隨昶至開封，太祖見而對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上曰：「歸蜀耳。」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獲歸老併門，妾之願也。」時上已有北征意，聞其言，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資賜。按孟昶在乾德三年三月自峽江下開封，五月即抵達開封近郊，六月孟昶即死於開封，²⁹ 則太祖與李氏的對話，應發生於同年五、六月間，反映太祖在乾德三年已有用兵北漢的意思，於同年某雪夜私訪趙普，商討出兵北漢的事情。

如果《東都事略》記錄無誤，則太祖在乾德三年(965)某下雪夜，私訪趙普，極有可能為了向趙普諮詢開寶元年(968)出兵北漢的事，非就整體戰略作出討論。事實上，《聞見錄》記錄「雪夜訪普」發生於開寶七年(974)九月用兵南唐前夕，與事實距離太遠，可信性很低。³⁰ 李燾將此事繫於開寶元年秋七月，是因為他沒有辦法弄清此事的發生年分，只能根據《聞見錄》記錄上一些錯誤的地方，再分析此事內容，推敲出此事

²⁸ 據《宋史》卷六十三〈五行志二上〉頁1384的記錄，太祖一朝無雪的年分，分別有乾德二年(964)、五年(967)、開寶元年(968)及二年(969)。另可參考李弘棋：〈宋代開封與杭州的氣候(初步的探討)〉，載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國史釋論》(臺北：食貨出版社，1987年)，上冊，頁120；及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臺北：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113，303-4。

²⁹ 《長編》，卷六，頁155，150，153。

³⁰ 按《聞見錄》有不少錯誤的記錄，例如卷一：「明日命帥，彬與美陞對，彬辭才力不迨，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頁4-5)而李心傳即加以糾正：「太祖遣曹彬取江南，潘美為副。太祖知美有謀難制，召二人升殿，謂曰：『但大使斬得副使，取得江南。』美震怖而出，由是迄無敗事。按國史，曹彬以宣徽使行；潘美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美不過闕也。太祖所言蓋諭彬之副田欽祚等爾。」(李心傳[撰]、崔文印[點校]：《舊聞證誤》[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一，頁5)更重要的問題是《聞見錄》的內容多為不利王安石變法及經略遼夏的，帶有特定的政治立場，則其記錄的客觀性亦有問題(曾瑞龍：〈戰略脫節：宋太宗第二次經略幽燕(986)〉，《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7期[1998年]，頁13)。例如鄧廣銘即曾反駁《聞見錄》關於王安石在宋遼地界交涉中「以與為取」的言論(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227-33)。

發生於太宗出任開封尹至出兵荆湖期間。剛巧北漢主劉鈞於開寶元年去世，於是把此事附載於開寶元年秋七月，正如他自己所言，「今因劉鈞死，附其事於開寶元年」。³¹ 否則，他找不到其他地方安插這條資料。《長編》雖能糾正前者一些錯誤地方，但仍未準確地推敲出其確切年分。今筆者運用《東都事略》的記錄以補其不足，推斷出「雪夜訪普」的發生時間有兩個可能，即乾德三年和四年(966)，而以乾德三年的機會是最大的。當時，太祖已先後用兵荆湖、後蜀，則「雪夜訪普」並非學者所言對宋初統一戰略的制訂，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趙普在制定統一戰略的過程之中，亦非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太祖沒有被趙普「先南後北」的戰略說服過來，則他當然有自己一套的想法。下一部分，筆者會進一步分析太祖與趙普等幕僚在統一戰略問題上，是存在分歧的。

「先南征，後北伐？」：太祖與其幕僚在統一戰略上的分歧

太祖在乾德三年(965)某下雪夜私訪趙普，商討用兵北漢的事情，史稱「雪夜訪普」。然而，太祖是否聽從趙普「先南後北」的戰略行事，完全放棄對北漢的軍事行動呢？太祖與群僚在統一戰略問題上又是否意見一致呢？

宋政權建立以後，北面有契丹及其支持的北漢；南面則有南唐、後蜀等政權。太祖面對這個形勢，傾向先對北漢用兵。³² 河東地區「俗悍而悖。當五代、國初時，號難攻取」，³³ 可見要解決北漢問題，非容易之舉。早在建隆元年(960)八月平定李筠之亂後，即欲用兵北漢，遂密訪後周宿將張永德，結果永德以「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可倉卒取也」為理由，反對冒險用兵，只主張「每歲多設遊兵，擾其田事，仍發間使諜契丹，先絕其援，然後可圖」，³⁴ 反映太祖救平內亂，即以北漢為首個用兵目標。不久，卻發生李重進之亂，阻礙太祖用兵的計劃。平亂後的建隆二年(961)，再次打算用兵北漢，乃詔華州團練使張暉入覲問其用兵戰略，³⁵ 他卻以「澤、潞瘡痍未

³¹ 《長編》，卷九，頁206。

³² 早在八十年代，伍伯常即指出：「征伐兩李(李筠、李重進)既非經濟因素所能解釋，東南諸國多因其他原故攻河東不下，臨時政策改變之犧牲品。」故此，太祖自始即以北方為用兵重心，其原因為(一)以往戰略傳統的影響(汴京與河東之對立)；(二)中原經濟仍能自給自足，不需依賴江淮物資；(三)河東有重關之險，可作為退卻契丹兵的關口(伍伯常：《中唐迄五代之戰略傳統與北宋之統一戰略》，頁947)。

³³ 蔡條(撰)、馮惠民、沈錫麟(點校)：《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二，頁30。

³⁴ 《長編》，卷一，頁21。

³⁵ 據《舊五代史》記錄，北漢亦有名叫張暉的武將，並曾於顯德元年(954)率領北漢的前鋒部隊自團柏谷向後周發動進攻(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一百十四〈周書·世宗紀第一〉，頁1511)。與正文提及的張暉可能為同一人。這亦可以解釋太祖何以向一位不見經傳的武將，詢問其對用兵北漢的意見。

瘳，軍務洵興，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圖之」為理由，³⁶ 反對用兵北漢。太祖聽從張暉意見，暫不用兵北漢。平蜀後的乾德三年(965)，太祖又於雪夜私訪趙普，表達同樣信息，這就是著名的「雪夜訪普」。結果，趙普答以「非臣所知」，迴避太祖問題。在太祖追問之下，趙普只好提出自己看法，認為「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³⁷ 開寶二年(969)春，太祖又打算用兵北漢。他借春宴機會向魏仁浦發出「欲征太原」的信息，仁浦即以「欲速不達」為諫，勸太祖勿冒進用兵北漢，太祖即點頭稱是。³⁸ 不久，太祖即第二次發動北伐，沒有把魏仁浦的話放在心頭。就我們所見，太祖共向四位幕僚表達欲用兵北漢的信息，所得回應卻只有一個——力量不足，暫緩用兵北漢，而趙普更明確指出北漢問題應留待其他政權消滅以後，才出兵解決。

儘管他們都以慎重為理由，反對毅然用兵北漢，但是，他們之間卻同中有異。張永德、張暉的議案較具彈性；而趙普的議案卻缺乏彈性，所謂「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即太祖先把北漢以外所有割據政權消滅，將北漢留為最後用兵的目標。而二張的提議明顯地具彈性得多，沒有定下攻打次序，只要認為時機合適，即可行動，沒有明顯「先南後北」的意向。³⁹ 很明顯，二張的提議更切合太祖的取向。⁴⁰ 而且筆者認為趙普亦錯誤地估計當時的形勢。按趙普建議把北漢視為最後用兵目標，原因就是「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所謂「二邊」應指西面的黨項、北面的契丹。然而，夏州李氏在太祖時期與宋政權維持友善關係，仍未成為邊患，更協助宋政權抗衡北漢，如建隆元年(960)三月北漢聯合代北諸部進攻河

³⁶ 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卷二〈太祖太宗親征北漢〉：「乾德元年四月上既誅李筠，將有事河東，詔張暉入覲，問以計策，暉曰：『澤潞瘳未復，軍旅一興，恐民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圖之。』」（頁26）《長編》卷四：「以華州團練使大城張暉為鳳州團練使、兼西面行營巡檢壕寨使。暉前在華州，治有善狀。上既誅李筠，將事河東，詔暉入覲，問以計策。暉曰：『澤、潞瘳未瘳，軍務洵興，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圖之。』上慰勞遣還。於是始謀伐蜀，乃徙暉鳳州。暉盡得其山川險易，因密疏進取之計。上覽之，甚悅。」（頁89）則乾德元年(963)夏四月為張暉出任鳳州團練使的時間，而入覲一事當在此之前。《宋史》卷二百七十二〈張暉傳〉則清楚地記錄：「建隆二年，太原未下，詔〔暉〕入覲問計。」（頁9319）今從《宋史》。

³⁷ 《長編》，卷九，頁204-5。

³⁸ 《東都事略》卷十八〈魏仁浦傳〉，頁4。關於太祖與魏仁浦的對話，《宋史》卷二百四十九〈魏仁浦傳〉的記錄略有不同：「朕欲親征太原，如何？」（頁8804）

³⁹ 伍伯常：《中唐迄五代之戰略傳統與北宋之統一戰略》，頁667-68。

⁴⁰ 其中，張永德能夠提出具體的措施，包括多設遊兵、擾其田事及發間使謀契丹，絕其外援。另外，提出類似建議者，還有絳州的薛化光。范鎮稱太祖「卒用其策而下河東」，不知張永德早已提出這種封鎖政策（范鎮〔撰〕、汝沛〔點校〕《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一，頁1）。

西，夏州李彝興立即遣部將李彝玉進援麟州，抵抗北漢。⁴¹ 又開寶八年(975)夏五月北漢主劉繼元招誘夏州諸部一同攻宋，為李光睿所拒，北漢主老羞成怒出兵進攻銀州。⁴² 第二年太祖第三次大舉用兵北漢，時為定難軍節度使的李光睿亦領軍出天朝、定朝兩關，協助宋軍作戰，⁴³ 攻破吳堡寨，斬首七百級，獲牛馬千計，俘虜寨主侯遇。⁴⁴ 則趙普何以認為西夏為宋之邊患呢？相反，夏州為太祖時期對付北漢的一個盟友，始終保持著友好關係。⁴⁵ 宋與西夏進入敵對狀態，為太祖以後的事情。至於宋遼接境之處，除河東以外，還有河朔地區，北漢政權是否作為宋遼間之屏障，實大有疑問。⁴⁶ 可見趙普的假設是存在問題的。

在這個提問——回應的過程，筆者發現兩個特點。首先，他們祖籍多為并人或燕人，如張永德為并州人、趙普及張暉為幽州人，反映太祖以為他們祖藉北方，有強烈光復鄉土的意識，可惜他們不同意用兵。其次，太祖多次向他們提及用兵北漢，完全在秘密，或私人聚會的情況下進行，如《長編》等正是用「密訪」來形容太祖與張永德的會談，卻非於朝廷上的御前會議進行廣泛討論。按理宋初統一戰爭為國家重要政策之一，應廣泛讓臣僚們討論各種戰略的可能性，以收集思廣益之效，為何太祖要故作神秘呢？筆者認為所以如此，實緣於太祖已有既定的統一戰略，多次向他們提出自己欲用兵北漢，目的正是試探他們對自己擬定的戰略之反應，亟欲爭取他們支持自己的戰略，倘若得到文武兩個集團的核心成員所認同與支持，則成功機會大增。太祖為行伍出身，且多次從周世宗南征北戰，深知軍旅之事。他渴望北伐能得到重要幕僚的擁護。然而，他們的意見偏偏與太祖的想法南轅北轍，規諫他不要冒險用兵北漢。事實上，我們從太祖與趙普之間的談話，亦看到君臣意見分歧的端倪。趙普為太祖最信任的謀臣之一，許多軍

⁴¹ 《長編》，卷一，頁11。

⁴² 吳廣成(撰)、龔世俊等(點校)：《西夏書事校證》(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卷三，頁34。

⁴³ 《長編》，卷十七，頁376-77。

⁴⁴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國傳上》，頁13983。

⁴⁵ 關於太祖時期的宋夏關係，可參考李範文：〈論西夏與宋的關係〉，載李範文：《西夏研究論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1-68；吳天墀：《西夏史稿(增訂本)》(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2年)，頁17；李蔚：《簡明西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59-61；王天順(主編)：《西夏戰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93-94；及杜建錄：《西夏與週邊民族關係史》(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39-41。

⁴⁶ 伍伯常：《中唐迄五代之戰略傳統與北宋之統一戰略》，頁947。我們時常談及北漢作為宋遼雙方的緩沖，多從宋的角度出發，事實上，從防禦戰略方面而言，北漢對契丹防禦宋軍的入侵，亦發揮一定的作用(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5)。

機要事皆問之於普，如建隆元年(960)冬十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作亂，太祖問趙普平亂之策，他即答以「李重進守薛公之下策，昧武侯之遠圖，憑恃長淮，繕修孤壘。無諸葛誕之恩信，士卒離心。有袁本初之強梁，計謀不用，外絕救援，內乏資糧，急攻亦取，緩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⁴⁷不久即下詔親征；又太祖一日拿著幽燕地圖問趙普「卿意此圖孰能為者」，普即答以「他人不能為，惟曹翰能為之」，太祖再問「何以知之」，普亦答以「群臣材謀無出於翰者，陛下若使翰往必克，但不知陛下遣何人代翰」，結果，太祖沒有再追問下去。⁴⁸這兩次談話，趙普均鮮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沒有迴避太祖的問題。趙普是一個聰明的幕僚，深知在此問題上與太祖意見相左，故當太祖夜訪詢問戰略的時候，他先答以「非臣所知也」，迴避太祖問題，最後太祖再追問之下，他沒有辦法只有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太祖亦處事圓滑，表面上認同他的統一戰略。⁴⁹

太祖在統一戰略問題上，自有其想法，並非以趙普意見為師。趙普只是其中一個被諮詢的幕僚。趙普議案的中心點，就是用兵北漢的先決條件，乃先平定其他割據政權，此種戰略明顯地不合太祖心意。

早在乾德元年(963)，太祖已有出兵北漢的意圖。據《長編》的記錄，此年閏十二月有消息傳出太祖將大舉「北征〔北漢〕」，於是「大發民餽運」，以致「河南民相驚，逃亡者四萬家」。然而，李壽在注文中卻認為「此時不聞有親征之議，蓋傳誤也」，否定太祖有用兵北漢的意圖。無可否認，我們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北征的跡象。但是，《長編》在卷九記錄雪夜訪普的時候，注文引錄《十國紀年》北漢天會七年(即宋乾德元年)記錄太祖曾於是年透過使者向北漢主劉鈞提出決戰，認為「君欲必欲中原，何不下太行，與君疋馬較勝負於懷、洛川」。結果，劉鈞只回覆「君欲決勝負，當過團柏谷，背城一戰」。⁵⁰太祖似乎想以激將法，使劉鈞沈不住氣，南下攻宋。如此，宋軍即可免卻勞師北行，強攻太原城，把損失減到最低，後來兩次的用兵北漢，反映宋軍遠征太原城是頗為困難的。劉鈞並非愚笨之人，自不會離開自己的老巢，亦沒有南下冒險的需要。太祖在乾德元年似乎有用兵北漢的可能，只是劉鈞沒有跌入他的圈套而已。可見李燾認為此年太祖用兵北漢是謬傳的看法，是有疑團的。

太祖在乾德三年(965)與趙普某雪夜詳談以後，沒有接受趙普的意見。開寶元年(968)八月他即大舉用兵北漢，太祖先遣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帶領部隊屯駐潞州，原因為「將有事於北漢也」。不久，太祖即組織戰鬥序列，任命昭義節度使李繼勳

⁴⁷ 《長編》，卷一，頁27。

⁴⁸ 《太平治跡統類》卷二〈太祖經略幽燕〉，頁2-3。

⁴⁹ 竺沙雅章《宋太祖與宋太宗》認為「〔太祖〕不是一個性格固執的人，他之所以採取先南後北的戰略，也許只是不敢反對大多數人認為首先應該南征的意見，而只好附和趙普的意見罷了」，則竺沙氏認為太祖內心深處不認同「先南後北」的戰略(頁81)。

⁵⁰ 《長編》，卷四，頁112；卷九，頁205-6。

為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黨進為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曹彬為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為先鋒部署，懷州防禦侯康延沼為都監；建雄節度使趙贊為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為副部署，隰州刺史李謙溥為都監。北漢樞密使馮峰領軍至洞過河，與宋軍相遇，發生激戰，宋軍何繼筠部斬敵首二千餘級，繳獲戰馬五百匹，俘虜北漢將領張環、石斌，奪取汾河橋，推進至太原城，焚燒延夏門。剛登位的劉繼元命殿直都知郭守斌率領內直兵禦敵，為宋軍擊敗。⁵¹十一月契丹派軍隊赴援，宋軍被迫撤退，而北漢即乘勢侵擾晉、絳兩州。⁵²這次用兵北漢由中央直接組織領軍行營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因為契丹派遣軍隊增援，所以宋軍被迫撤退。

有些學者把開寶元年(968)用兵視為戰略的調整，並非改變「先南後北」的戰略。⁵³因為此年秋七月北漢主劉鈞卒，太祖認為有機可乘，遂大舉出兵北漢。如此，我們如何解釋開寶二年(969)的用兵呢？第一次用兵無功而還，宋軍士氣受挫，且北漢乘勢侵擾晉、絳邊州；北漢的劉繼元已經即位，內部政治形勢漸趨穩定，宋軍應無機可乘，該把視線轉往江淮地區。然而，太祖仍於次年再次用兵北漢。他似乎有一種必滅北漢而肯罷休的決心。⁵⁴

開寶二年春正月太祖又再次用兵北漢，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人赴各地準備軍儲，調赴太原，又發諸道兵屯駐於潞、晉及磁等地。二月，即命宣徽南院使曹彬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黨進先領軍赴太原，隨即下詔親征，任命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為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建雄節度使趙贊為馬步軍都虞候，先赴太原；彰德節度使韓重贇為北面都部署，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為石嶺關部署，以攔阻契丹援軍；潁州團練使曹翰為河東行營都壕寨使，王令鼎為副使。⁵⁵宋軍推進至太原城，爆發激烈的圍城戰，韓重贇、何繼筠分別於嘉山及陽曲成功截擊契丹援軍，令太原城更加危急，宋軍企圖引汾水灌太原城，再配合部隊進攻。⁵⁶最後，因暑雨令許多宋軍將士患上腹病，加上契丹再次派軍隊赴援，城池久攻不下，宋軍只好撤退。⁵⁷太祖連遭兩番敗績，暫時不再用兵北漢，直至開寶九年(976)，他再次用兵北漢，仍未能成功。過去，學者多以為北漢憑藉契丹的力量，

⁵¹ 同上注，卷九，頁207，208-9。

⁵² 關於契丹軍隊赴援的記錄，宋遼史書均有記錄，分見《長編》，卷九，頁212；脫脫等：《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七〈穆宗紀下〉，頁86。

⁵³ 例如張其凡《趙普評傳》認為「在向南用兵的過程中，太祖和趙普並沒有拘泥於已定的戰略計劃，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作了適當的調整」（頁113）。

⁵⁴ 王育濟、白鋼認為北漢主劉繼恩被殺是「太祖一手策劃，侯霸榮等人出面完成的一起旨在配合宋軍攻滅北漢的隱秘事件」，則太祖是處心積慮要於此時用兵北漢的（王育濟、白鋼：〈宋太祖遣使行刺北漢國主考〉，《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頁96）。

⁵⁵ 《長編》，卷十，頁216，220-21，218。

⁵⁶ 文瑩（撰）、鄭世剛、楊立揚（點校）：《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三，頁26；《長編》，卷十，頁222。

⁵⁷ 《長編》，卷十，頁224。

才能抵擋宋人多次的進攻。然而，經過兩次大規模的攻城戰，宋軍仍未能攻破太原城，可見北漢是有一定戰鬥力的，可以於一段時間內抵禦宋軍的攻擊，以待契丹援兵。⁵⁸

明顯地，太祖沒有跟從趙普的戰略，以實踐統一全國的政策。因為趙普的戰略為「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太祖應該等待諸國平定以後，才出兵北漢。可是，他於平蜀不久的開寶元年(968)即發動對北軍事行動，而江淮的南唐，以至南漢仍未消滅。假若開寶元年或二年(969)用兵北漢成功，則宋初削平諸國次序即成為：荆南 — 湖南 — 後蜀 — 北漢 — 南漢 — 南唐 — 漳泉 — 吳越，我們還可以說宋初「統一戰略」為「先南後北」嗎？⁵⁹ 事實上，太祖即位以來，宋軍的邊防將領即多次主動出擊北漢，雙方時常發生軍事衝突。我們根據附表「宋與北漢軍事衝突年表(960-976)」的統計，可知宋與北漢的軍事衝突是非常頻密的，最嚴重一次發生於乾德二年(964)春正月，太祖詔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兵馬鈴轄康延沼，馬步軍都軍頭尹勳等主動出擊，率領步騎萬餘向北漢遼州發動進攻，與北漢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部於城下發生戰鬥，北漢軍大敗，遼州刺史杜延翰與軍士三千人舉城投降。戰事並未停止，契丹遣西南面招討使耶律達里(撻烈)率步騎六萬赴援。李繼勳與彰德節度使羅彥瓌、西山巡檢使郭進、內客省使曹彬等率六萬宋軍赴援，大敗遼漢聯軍於遼州城下，⁶⁰ 則遼州城一戰，三方動員軍隊數目達到十三萬人以上，規模可謂不小。太祖與趙普商議後，仍沒有改變其一貫想法，更不惜與北漢發生軍事衝突，甚麼「先南後北」、「南征北禦」均非其設想的戰略。相反，宋政權建立以後，一直與南唐保持和平的關係。如太祖即位後，即釋放在後周時被俘的南唐武將。同時，雙方均常派遣使者互訪，維持良好的關係，如建隆元年(960)三月南唐主遣使者至宋，祝賀太祖登位，而宋亦不時派遣使者至南唐，如建隆二年(961)二月太祖遣通事舍人王守正出使南唐。這種互派使者的做法，並不限於宋政權建立初期，反映太祖暫時沒有對南唐動武的想法。據《長編》記錄「〔南〕唐主雖通職貢，然亦增修戰備」，太祖卻只命鎮國軍節度使宋延偁率領數千禁軍於新池進行軍事演習。⁶¹ 除此以外，他沒有作出進一步的行

⁵⁸ 戰略學家B. H. Liddell Hart即指出「攻打城池是最不經濟的作戰方式」(B. H. Liddell-Hart, *Strategy* [New York: Praeger, 1967], p. 51)。事實上，太祖亦明白箇中道理，不希望損耗實力，遂於攻城以前，先遣使者至太原勸降，希望能夠和平接收太原城，惜為北漢主所拒絕。最後，只有發動部隊攻城(《長編》，卷九，頁210)。

⁵⁹ 伍伯常即指出很多學者存在一種誤解，就是把北宋平定諸割據政權的次序看成為太祖等人刻意設計出來的(《中唐迄五代之戰略傳統與北宋之統一戰略》，頁947)。

⁶⁰ 《長編》，卷五，頁121。按《宋會要輯稿》記錄宋軍與北漢的軍事對抗，除了開寶元年(968)、二年(969)及九年(976)三次用兵北漢以外，亦記錄此次戰役，則其記錄者亦認為遼州戰役的規模，足可與前述三次「北伐」相提並論(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前北平圖書館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57年]，〈兵七〉，頁31)。

⁶¹ 《長編》，卷一，頁7，10；卷二，頁39；卷五，頁96。

動，如派遣軍隊抄略南唐邊境等。這種形勢，跟北部戰線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可見太祖是重視北部戰線的。倘若太祖要實行「先南後北」的統一戰略，則他似乎不應該容許邊境將領隨意挑起邊境軍事衝突，造成北部邊境的動盪不安，相反，他應該維持其和平與安定的局面。

趙普提出「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的戰略，沒有把太祖說服過來。否則，我們如何解釋一連串宋軍發動的軍事行動及後來兩次北伐呢？事實上，太祖這種表裏言行不一的行為，唯一的解釋就是太祖根本不贊同「先南後北」的戰略，他分別向張永德、張暉、趙普、魏仁浦表達自己欲北伐的意向，正希望獲取他們的支持，使北伐行動能在君臣意見一致的情勢下展開。然而他們沒有認同太祖的統一戰略，均以爲對北漢不可輕舉妄動。而趙普更爲太祖訂定缺乏彈性的戰略。最後，太祖可說在一意孤行下組織大軍，展開對北漢的猛烈攻勢，而這位深受太祖倚重和信任的幕僚趙普亦無法扭轉大局。以上，分析出太祖與其幕僚在統一戰略問題上是南轅北轍的，那麼他何以有先解決北漢問題的構想呢？這是下一部分要解決的問題。

地域的限制與歷史的經驗：宋太祖統一戰略的產生背景

自始，太祖即沒有實行「先南後北」戰略的意思，始終積極地用兵河東，欲盡快解決北漢問題。這或許與北漢牽涉宋政權內部的叛亂有關係。趙匡胤取得政權不久，後周宿將李筠便起事叛宋，而北漢支持李筠作亂，令太祖十分惱火，必欲滅北漢而後快。更重要的原因則與五代以來的戰略傳統有關。關於戰略傳統的問題，伍伯常曾以中唐迄五代的戰略傳統，解釋宋初統一戰略，強調汴梁(朱溫)與河東(李克用)在傳統上的對立局面。故此，太祖得國後，始終以北漢爲主要用兵對象。⁶² 但是，他忽略當時另一個牽涉南方的戰略傳統。現代社會，交通、通訊等科技已經逐步地打破地域的限制，但是，地域因素在古代往往爲構成某種戰略的重要基礎。⁶³ 我們不妨從地緣角度分析太祖戰略的產生背景。五代以來中國逐步形成三個政治核心區：(一)北方地區的(包括契丹政權控制的十六州及太原的北漢)；(二)中原地區(梁、唐、晉、漢、周及後來的北宋政權)；(三)南方地區(包括南唐、南漢及後蜀等政權)。雖然中原地區的政權實力較強，但是在契丹及江淮政權的包圍之下，不一定佔有優勢。我們再細心一點觀察，更發現北漢(北)、南唐(東)及後蜀(西)三個政治勢力對宋政權構成一個三角形的包圍狀態。⁶⁴ 若

⁶² 伍伯常：《中唐迄五代之戰略傳統與北宋之統一戰略》，頁643-44。

⁶³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頁125。

⁶⁴ 類似的分析，還見之於吳楓、任爽：〈從分合大勢看南唐的歷史地位〉，載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主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頁152。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三方組成某種形式的政治聯盟，甚至軍事聯盟，宋政權就有可能應付三面的進攻，再加上契丹的配合作戰，則威脅更大。早在五代時期，周世宗用兵南唐期間，契丹便曾派遣一萬騎抄略其邊境，被邊防將領郭崇大敗於東鹿。⁶⁵ 太祖對此種情況，相信有一定的認識。

這種戰略傳統在宋政權建立以前已經出現，對太祖統一戰略的產生背景，必定發生一定的影響，正如一些戰略學家指出，「歷史不僅構成戰略思想的背景，而且還時常被應用在決策過程之中」。⁶⁶ 如閩國遣使通好契丹，為石晉拘留，最後在契丹壓力下，放還閩國使者。⁶⁷ 南唐李昇有一統天下之志，力量卻不及中原政權，⁶⁸ 遂產生出「聯結北方」的戰略，企圖以契丹牽制中原政權，使其無法南侵，甚至可以南北夾擊，使其疲於奔命。關於南唐與契丹的關係，陸游《南唐書》有〈浮屠契丹高麗列傳〉，反映他們之間關係密切。據學者統計，南唐與契丹的聘使，自昇元元年(937)至保大十五年(957)二十一年間，共三十八次。其中，南唐使契丹二十六次；契丹使南唐十二次，他們更使用蠟丸書方式聯絡，增加保密程度。⁶⁹ 如會同三年(940)十一月南唐遣使奉蠟書言晉密事；天祿二年(948)夏四月南唐遣李朗、王祚來慰旦賀，兼奉蠟丸書，議攻(後)漢。⁷⁰ 李昇的謀臣宋齊丘於昇元元年便請通好契丹，以宮女繪綵珠璣遣泛海而行，而契丹主耶律德光亦遣使至南唐，以厚幣遣還，「於是交聘往來者不絕」。⁷¹ 其間，南唐君臣不僅與契丹建立外交關係，且欲離間契丹與中原政權間的關係，剛巧契丹主遣使者燕人高霸來報聘，於北歸途中，使人殺之於淮北，且把其兒子高乾藏匿於濠州，以致契丹以為石晉遣人殺其使者於境內，⁷² 耶律德光遂遣軍抄略石晉邊境以作報復。據《江南野史》所言，這類刺殺行動「如是者數四」，⁷³ 以至兩國「漸生隙」，可見南唐這種「聯結北方」的戰略，成功地離間契丹與中原政權的關係。而中原政權亦明瞭箇中道理，實行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保大十二年(954)秋七月，契丹主遣其舅至南唐報

⁶⁵ 《東都事略》卷二十一〈郭崇傳〉，頁6。

⁶⁶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頁132。

⁶⁷ 吳任臣：《十國春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十二〈閩三·景宗本紀〉，頁2。

⁶⁸ 儘管南唐的版圖、人口等方面不及中原政權，但其領地「北隔長淮與中原相對，東鄰閩越，西有荆楚，南倚南漢，處於南北中國交通之要衝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吳楓、任爽：〈從分合大勢看南唐的歷史地位〉，頁152)。

⁶⁹ 張國慶：〈南唐、契丹之聘使及其目的〉，《江海學刊》1993年第2期，頁114。

⁷⁰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頁49；卷五〈世宗紀〉，頁64。

⁷¹ 龍袞：《江南野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先主〉，頁6。

⁷² 陸游：《南唐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八〈浮屠契丹高麗列傳〉，頁6。

⁷³ 《江南野史》卷四〈宋齊丘傳〉，頁7。

聘，夜宴於清風驛，為後周將領荆罕儒遣刺客殺害，且砍去其頭顱，⁷⁴「自是唐與契丹遂絕」。⁷⁵ 後周先離間契丹與南唐的關係，第二年即用兵後蜀，且與援助後蜀的南唐發生戰鬥。其間，南唐曾遣使者至契丹求援，卻為周人所執，以免契丹的介入。周世宗在〈征淮南詔書〉亦明白指出其「結契丹太原之罪」，⁷⁶ 則南唐不僅聯絡契丹，且有聯絡北漢的嫌疑。南唐在應曆三年(953)三月遣使入貢契丹之際，亦「附書于〔北〕漢」。⁷⁷ 南唐以外，盤據西川的後蜀政權亦清楚此戰略對自己的好處。廣政二十七年(962)冬十月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進言「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自黃花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⁷⁸ 於是孟昶即遣使持書通好太原，且尊劉鈞為天子，惜使者為宋疆吏所獲，⁷⁹ 埋下日後太祖用兵後蜀的伏線，至是太祖亦感受到其威脅。後來，太祖下詔用兵後蜀時，即指出「近擒獲西川偽樞密院大使程官、孫遇等三人，搜得孟昶與河東劉鈞蠟書，潛相表裏，欲起寇戎，致姦謀之自彰」。開寶二年(969)二月，太祖下親征北漢手詔，仍譴責北漢「數結蜀川」，⁸⁰ 則太祖必欲先削平北漢，避免此戰略的實現。此亦可以解釋何以太祖於用兵後蜀以後，即把兵鋒直指北漢，於開寶元年(968)及二年兩度大舉用兵北漢，欲一舉解決北漢問題，免除後顧之憂。

太祖欲解決北漢問題，即需面對雄據北方的契丹，所謂「汾晉所恃而為吾患者，北援〔契丹〕也」。⁸¹ 然而，軍事力量適用於北漢，卻不適用於契丹。在此，我們先闡明一個問題，即學術界有一個看法，就是宋初「先南後北」戰略的「北」包含兩個範疇：即佔據河東的北漢與被契丹控制的十六州之地。如鄧廣銘、王煦華、金永高、張其凡等

⁷⁴ 《南唐書》卷十八〈浮屠契丹高麗列傳〉云：「〔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蕃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頁6）然而鄭滋斌卻有所懷疑：「罕儒以四月而得世宗之信任，委以此事，雖不謂無此可能，然似難得遽任。」（鄭滋斌：《陸游〈南唐書本紀〉考釋及史事補遺》〔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頁161-62）

⁷⁵ 《南唐書》卷十八〈浮屠契丹高麗列傳〉，頁6。

⁷⁶ 同上注，卷十三〈劉潘李嚴張龔刊傳〉，頁1-2。

⁷⁷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頁71。

⁷⁸ 《十國春秋》卷四十九〈後蜀二·後主本紀〉，頁29。按張廷偉的戰略構想已超越保有蜀地之範疇，控有關右之地，正是進取中原的基礎。按蜀漢諸葛亮多次攻魏失敗，皆因未能控有關右之地。

⁷⁹ 《玉壺清話》，卷六，頁60；張唐英：《蜀橋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下，頁13-14。按《長編》卷五乾德二年十一月頁134所記有異，宋之所以獲得後蜀聯絡北漢的文書，是因使者之一的趙彥韜背叛後蜀，潛取其書以獻。

⁸⁰ 《宋會要輯稿》，〈兵七〉，頁24，3。

⁸¹ 《鐵圍山叢談》，卷二，頁30。

即持此說。⁸² 近來，這個說法已被一些學者所反駁，如王育濟、李華瑞。⁸³ 筆者認為太祖的統一戰略是把契丹排除在外的，例如太祖將所得財帛藏之於封樁庫，且對近臣說：「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念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從我，即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⁸⁴ 這條資料為許多學者引用，藉以證明太祖沒有忘記十六州之地。如果我們再細讀此條資料，卻可能有另一種詮釋。太祖不是說先用金錢贖回(和平手段)十六州，到迫不得已之際，才不惜與契丹兵戎相見，運用軍事力量奪回失地(十六州)。太祖可謂兩宋時代最先提出使用金錢外交的君主。基本上，太祖對契丹的態度可以用「來則驅逐，去則莫追」兩句來形容，如乾德三年(965)契丹抄略易州，虜略宋的邊民，太祖指示邊將作出類似的報復行動，待契丹釋放被俘宋邊民，則放還虜略回來的契丹邊民；四年(966)契丹再次抄略易州，為監軍任德義擊退，並無任何追擊契丹軍的記錄，只令邊將領部隊校獵於幽州邊境，以示抗議；開寶三年(970)契丹六萬騎南至定州，太祖令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部隊三千禦敵，並指示田欽祚「敵至即戰，勿與追逐」。⁸⁵ 很明顯，太祖的統一戰略，就北方而言，是以北漢為唯一目標，不想與契丹為敵。

開寶七年(974)宋遼關係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為解決北漢問題露出一線曙光。⁸⁶ 據《長編》記錄，這年十一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以「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長為鄰國，不亦休哉」為理由，主動致書宋權知雄州、內園使孫全興，請致和議，而太祖亦命全興回覆，表示願意和好。⁸⁷ 《長編》以外，其他宋人著作如《宋朝事實》、《宋會要輯稿》等亦作如是記錄。⁸⁸ 但是，宋人記錄宋遼關係，往往有不實的地方。我們再翻閱契丹方面的記錄，卻為另一種說法。如《遼史》記錄為「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朮加侍中與宋議和」，則主動提出請和者為宋人。另據《遼史》卷八十六〈耶律合住傳〉，有「宋數遣人結歡，冀達和議，合住

⁸² 鄧廣銘：〈論趙匡胤〉，《新建設》1957年第5期，頁32；王熙華、金永高：〈宋遼和戰關係中的幾個問題〉，《文史》第9輯(1980年)，頁229；張其凡：〈趙普評傳〉，頁126。

⁸³ 王育濟：〈宋初「先南後北」統一策略的再探討〉，《東岳論叢》1996年第1期，頁84-86；李華瑞：〈關於宋初先南後北統一方針討論中的幾個問題〉，《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4期，頁51-54。

⁸⁴ 王闢之(撰)、呂友仁(點校)：《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一〈帝德〉，頁3。

⁸⁵ 《長編》，卷六，頁160；卷七，頁166-67；卷十一，頁252。

⁸⁶ 關於太祖時期的宋遼關係，可參考王明蓀：〈契丹與中原本土之歷史關係〉，載王明蓀：《宋遼金史論文稿》(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頁1-31；及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4年)，上冊，頁171-75。

⁸⁷ 《長編》，卷十五，頁328。

⁸⁸ 《宋朝事實》卷二十〈經略幽燕〉，頁317；《宋會要輯稿》，〈蕃夷一〉，頁2。

表聞其事，帝許議和」的記錄，⁸⁹按陳述的考證，耶律琮、耶律昌朮與耶律合住應為同一人。⁹⁰如此，則宋人可能是主動提出和議者。王煦華、金永高認為此次和議，宋人應為主動提出者；聶崇岐則認為出於契丹的可能性較大，因為「講和當然遣使互聘，然後方能及於賀正之事。今《遼史》於宋遣使請和，派人與之議和。未書交換聘使，即書正月宋使來賀，於理殊有不合。此蓋遼人修辭，元修《遼史》因之未改耳」。陶晉生亦認同聶氏的看法，認為「耶律琮信裏『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看來，確為契丹地方官首先發起建交之舉」。⁹¹但是，筆者根據上述的分析，認為宋政權極有可能面對多面包圍的威脅，則似乎宋人有較強烈的動機提出和議。無論此次提出和議的主動者是誰，太祖均充分利用此次良機，藉以締造宋遼間和平友好關係，目的是希望與契丹建立友好的睦鄰關係，為開寶九年(976)出兵作外交準備，使契丹不再援助北漢，順利地消滅北漢。這次出兵，北漢同樣地向契丹求援，契丹即派遣南宰相耶律沙、冀王敵烈領軍赴援。⁹²很明顯，太祖聯遼以絕北漢的戰略是失敗的，契丹沒有因與宋關係改善而置北漢於不顧。不久，宋軍因太祖去世，隨即停止軍事行動。太祖為早日解決北漢問題，不惜與契丹修好，望其於宋漢戰事爆發的時候，採取中立態度，不再援助北漢，與宋軍為敵；同時，亦反映出太祖的北方統一範圍，止於北漢佔有的河東地區，暫不以武力處理十六州之地。

可見太祖從地域的角度考慮到宋政權的處境，是處於四面包圍的不利局面。儘管宋政權的實力非南唐、北漢等所能比擬，但是他們聯合起來組成某些聯盟，對宋必定產生一定威脅，更令太祖感到憂心的是契丹的態度。歷史的經驗亦令太祖知道契丹與南方政權是有聯絡的。最後，太祖選擇先處理北漢的問題，然而，卻設法避免與契丹發生嚴重衝突。

結 論

過去，學者多認為「雪夜訪普」發生於太祖發動統一戰爭以前，太祖聽從趙普的戰略，先用兵南方諸地方政權，然後用兵北漢，甚至十六州之地。可是，此事極有可能發生於乾德三年(965)。當時，宋的統一戰爭已經展開，則「雪夜訪普」在宋初統一戰略確立方面的作用，是可爭議的；趙普對宋初戰略所發揮的作用，亦成疑問。太祖根據地域、

⁸⁹ 《遼史》卷八〈景宗紀上〉，頁94；卷八十六〈耶律合住傳〉，頁1321。

⁹⁰ 陳述(輯校)：《全遼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四〈耶律琮神道碑〉，頁84。此神道碑亦收入向南(編)：《遼代石刻文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56-61。

⁹¹ 王煦華、金永高：〈宋遼和戰關係中的幾個問題〉，頁235；聶崇岐：〈宋遼交聘考〉，載聶崇岐：《宋史叢考》(臺北：華世出版社，1986年)，頁284；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頁19。

⁹² 《遼史》卷八〈景宗紀上〉，頁95。

歷史的因素，考慮到五代以來南方政權「聯結北方」的戰略，意識到用兵北漢是刻不容緩的。期間，他先後向趙普、張永德、張暉、魏仁甫提議用兵北漢，均得不到積極回應，卻沒有像竺沙雅章所言，就此聽從趙普等人意見，將北漢擱置一面。平定後蜀後，就先後兩次大舉用兵北漢，貫徹其統一戰略。宋與北漢之間，亦非一些學者所描述，是一種靜止的狀態。太祖在位近十六年，與北漢的軍事衝突可謂無日無之，更曾與契丹軍隊交手。經過兩次用兵北漢失敗的教訓，太祖知道欲解決北漢，關鍵就是契丹的態度，遂向契丹擺出友善姿態，建立友好外交關係，重施五代以來拉契丹以打擊敵對政權的間接戰略，希望契丹不再插手北漢事務，並諒解宋政權的軍事行動，為宋軍用兵北漢的時候，消除最大的障礙。開寶九年(976)的出兵，仍以失敗告終，太祖更於期間去世，遺留下未解決的難題，給繼位的宋太宗。太宗即位以後，即改變其兄的戰略，不僅運用軍事力量解決北漢問題，且運用於契丹問題上，導至宋遼雙方長期的緊張關係。⁹³

(本文撰寫後承蒙陳學霖教授、曾瑞龍教授及蘇基朗教授諸位老師賜予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⁹³ 北宋名臣曾鞏認為契丹自破滅後晉以來，經歷後漢、後周，成為中國嚴重的邊患。北宋代周以後，由於「太祖明經倫之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達到「疆境泰然，無北顧之憂」。然而，太宗即位以後，卻「既破虜而平晉，遂用事於燕，不克而還」。結果，契丹即成為「中國之患」(曾鞏[撰]、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四十九〈本朝政要策·契丹〉，頁672-73)。可見曾鞏認同太祖對契丹採取防守的戰略。相反，太宗主動出擊的戰略是導致日後契丹成為邊患的開端。

附表：宋與北漢軍事衝突年表(960-976)

凡例			
(一)年分日子加上()，表示該日子或許不對，有待考證；			
(二)資料來源舉例，如《長編》1：11即表示出於《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頁11，所用版本則詳見本文注釋；			
(三)本表所用資料，計有《宋史》、《遼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續資治通鑑》、《太平治跡統類》、《十國春秋》、《宋會要輯稿》、《宋朝事實》、《宋史全文》。			
年分	事件	資料來源	備注
建隆元年(960)三月(己巳)	北漢誘代北諸部進攻河西，詔諸鎮會兵防守，後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興遣部將李彝玉進援麟州，北漢軍退。	《長編》1：11 《宋史》85：13982-83	
建隆元年夏四月癸巳	昭義軍節度使李筠起事叛宋，遣歸德軍節度使石守信等領軍征討。	《宋史》1：6	
建隆元年五月丁卯	前軍都部署石守信、副都部署高懷德敗李筠部隊三萬多人於澤州南，殺北漢援軍之降者數千人，獲北漢河陽節度使范守圖。	《長編》1：16 《宋史》1：6 《續通鑑》1：14	
建隆元年五月(丁卯)	永安(軍)節度使折德辰破北漢沙谷寨，斬首五百級。	《長編》1：16 《宋史》1：6 《續通鑑》1：14 《十國春秋》105：4-5	按《宋史》及《十國春秋》均作「六月甲午」 按《續通鑑》作「沙石寨」
建隆元年六月庚申	宋軍進攻石州，契丹遣大同軍節度使阿剌領四部、蕭思溫領三部赴援。	《遼史》6：76 《十國春秋》105：5	
建隆元年七月亥朔	宋軍攻陷石州。	《遼史》6：76	

年分	事件	資料來源	備注
建隆元年九月壬寅	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領軍掠北漢平遙縣，擄掠甚眾	《長編》1：23 《宋史》1：7 《宋史》482：13935 《續通鑑》1：19 《十國春秋》105：5	按《宋史》卷482〈北漢世家〉作「鈞平遙」
建隆元年九月甲子	宋軍邊將獲北漢民數百人，俱釋之	《長編》1：25	
建隆元年冬十月乙酉	晉州兵馬鈐轄、鄭州防禦使荆罕儒領軍掠北漢汾州，戰死城下	《長編》1：26-27 《統類》2：25 《十國春秋》105：5	
建隆二年(961)三月(辛亥)	北漢進攻麟州，為防禦使楊重勳領軍擊退	《長編》2：41 《統類》2：25	按《統類》作「二月」
建隆二年十一月(癸未)	西山巡檢使郭進敗北漢軍於汾西，獲牛驢數千計	《長編》2：56 《續通鑑》2：39	
建隆二年十二月乙未	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敗北漢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俘遼州刺史傅廷彥弟勳以獻	《長編》2：56 《宋史》1：10 《十國春秋》105：5	按《宋史》及《十國春秋》皆記俘獲傅廷彥及勳兄弟二人
建隆三年(962)二月甲寅	北漢進攻潞、晉二州，為守軍擊退	《長編》3：63 《宋史》1：11 《十國春秋》105：5	
建隆三年三月丁亥	徙北漢降民於邢、洛三州，計口賦以粟	《長編》3：64 《宋史》1：11	
建隆三年夏四月壬寅	邢州言北漢太原民四百七十人來降	《長編》3：66 《統類》2：26	
建隆三年四月	北漢都指揮使蔚進、郝貴超聯合契丹軍入侵，為守軍擊退	《統類》2：26	
建隆三年夏四月(戊申)	北漢進攻麟州，為防禦使楊重勳擊退	《長編》3：67	
建隆三年秋七月己卯	北漢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來降	《長編》3：70	

年分	事件	資料來源	備注
建隆四年(963)冬(月分缺)	太祖將有事於南郊，命四路用兵，略地太原，鄭州刺史孫延進，絳州刺史沈繼深，通事舍人王睿等領軍出陰地，以李謙溥為先鋒，會於霍邑	《宋史》273：9338-39	
乾德元年(963)夏四月(甲辰)	命磁州分閑田以處北漢降民，仍賜耕牛及錢米	《長編》4：90	
乾德元年秋七月丁巳	安國(軍)節度使王全斌與西山都巡檢使、洺州防禦使郭進，趙州刺史陳萬通，鎮州兵馬鈐轄、登州刺史高行本，客省使曹彬等領軍深入至太原境內，獲生口數千人	《長編》4：97 《宋史》1：14	
乾德元年八月丁亥	王全斌、郭進及曹彬領軍進攻北漢樂平縣，北漢拱衛指揮使王超、侯霸榮等及所部兵一千八百人投降，侍衛都指揮使蔚進及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偕契丹軍赴援三戰皆敗，宋軍取樂平，改為樂平軍，降軍皆編為效順軍	《長編》4：103 《統類》2：26 《宋史》1：15 《宋史》258：8978 《十國春秋》105：5-6	按《宋史》、《統類》及《十國春秋》作「平晉軍」
乾德元年八月丙申	北漢靜陽(等)十八寨首領相帥來降	《長編》4：104 《統類》2：26 《宋史》1：15	按《統類》作「靜陽等十八寨」及「相率來降」

年分	事件	資料來源	備注
乾德元年九月戊寅	北漢誘契丹軍六萬進攻平晉軍，洺州防禦使、西山巡檢使郭進，趙州刺史陳萬通，濮州防禦使張彥進，客省使曹彬等領步騎萬餘往救，未至而敵軍遁去	《長編》4：106 《宋史》1：15 《十國春秋》105：6	
乾德元年十二月(乙巳)	內客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繼筠分往晉、潞、洲，與節度使趙彥徽及李繼勳會兵進攻北漢邊邑及遼、石二州	《長編》4：112	
乾德元年閏十二月乙亥	永安(軍)節度使折德貞敗北漢軍數千於府州城下，擒其衛州刺史楊璘	《長編》4：113 《宋史》1：16 《十國春秋》105：7	
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	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兵馬鈐轄康延沼，馬步軍都(軍)頭尹勳等領步騎萬餘攻遼、石二州，刺史杜延翰等舉城投降；契丹步騎六萬赴援，李繼勳與彰德節度使羅彥瓌，西山巡檢使郭進，內客省使曹彬等領軍六萬人迎戰，大敗遼漢聯軍於城下；又進攻平晉軍，遣郭進、曹彬領步騎萬餘往救，未至而遁	《宋會要輯稿》兵7：31 《長編》5：121 《統類》2：1 《宋朝事實》20：316 《宋史》254：8893 《遼史》7：81 《十國春秋》105：7 《續通鑑》3：74-75	按《宋朝事實》作「內客省使武懷節」 按《十國春秋》作「二月」及「尹訓」 按《宋會要輯稿》作「二月」及「尹訓」
乾德二年二月壬申	北漢敗宋軍於石州	《遼史》7：81 《十國春秋》105：7	
乾德二年三月乙未	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四人來降，各賜分物有差，以審玉為汾州團練使，改名承	《長編》5：124 《宋史》1：17 《十國春秋》105：7	

年分	事件	資料來源	備注
乾德二年夏四月丁卯	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領軍赴潞州屯駐，以備北漢	《長編》5：126	按《宋史》作「遣馬軍都校劉光將兵戍澠，備鈞入侵」
乾德二年六月(辛未)	釋放北漢俘虜千人，賜衣履，分隸畿縣民籍	《長編》5：128	
乾德三年(965)三月乙未	詔河東軍寨遣人入北漢境，招諭北漢吏民投誠。	《長編》6：149	
乾德三年三月(乙未)	晉州言北漢羅侯、松谷兩寨指揮使張貴等七百餘人來歸	《長編》6：150	
乾德三年六月(庚戌)	潞州言太原官吏將校多來附者	《長編》6：155	
乾德四年(966)春正月(己丑)	北漢進侵，命西北諸鎮出兵防禦	《長編》7：166 《宋史》274：9359	按《宋史》記乾德「四年春，并人入寇樂平，〔田欽祚〕從羅彥瓌拒之」不知與《長編》所載是否為同一事
乾德四年二月丙辰	安國(軍)節度使羅彥瓌與西上合閭副使田欽祚敗北漢軍於靜陽，斬首千餘級，擒其將鹿英，獲馬三百匹，兵仗三萬餘	《長編》7：167 《宋史》2：23 《續通鑑》4：96	按《十國春秋》作「春正月」
乾德四年二月辛酉	令西北諸州以田及農具種食給予所俘之北漢生口	《長編》7：167	
乾德四年十二月(庚辰)	北漢遣侍衛都虞候劉繼業等領軍收復遼州	《長編》7：183	
乾德五年(967)三月丙辰	鎮州言北漢石盆鎮(寨)招收指揮使言章以其寨來降	《長編》8：192 《宋史》2：26 《續通鑑》5：107	按《續通鑑》作「招收指揮巡檢使」及「閻章」 按《宋史》作「閻章」

年分	事件	資料來源	備注
乾德五年五月(乙巳)	鎮州言北漢鴻唐寨招收指揮使樊暉殺監軍成昭以寨來降	《長編》8:194 《宋史》2:26 《宋史》482:13935-36 《續通鑑》5:108 《十國春秋》105:8	按《續通鑑》作「鳩唐寨」 按《十國春秋》作「夏四月」 按《宋史》卷482〈北漢世家〉作「四月」
開寶元年(968)春正月乙巳	晉州言北漢偏城寨招收指揮使任守恩一百五十人來降	《長編》9:199 《宋史》2:27 《十國春秋》105:8	按《宋史》作「任恩」
開寶元年三月甲辰	百井寨出軍進攻北漢馬鞍山寨，斬獲數十人	《長編》9:201 《宋史》482:13936 《十國春秋》105:9	按《宋史》及《十國春秋》作「鎮州守將」
開寶元年夏四月(丙子)	晉州言北漢軍校翟洪貴等二百餘人來降	《長編》9:202	
開寶元年秋七月(丙午)	鎮州言北漢烏玉寨主胡遇及其家屬等一百三十九人來降	《長編》9:204 《續通鑑》5:113 《宋史》2:27	按《續通鑑》作「烏玉寨」 按《宋史》載開寶元年秋七月丙申「北漢潁州寨主胡遇等來降」不知是否為同一人
開寶元年八月丙寅	太祖遣客省使盧懷忠領軍屯駐潞州，準備發動第一次「北伐」	《長編》9:207 《宋史》2:27 《宋史全文》2:4	
開寶元年十一月(癸卯)	契丹遣南院大王撻烈為兵馬總管領軍援北漢，宋軍被迫撤退，北漢乘勢大掠晉、絳二州邊境，第一次「北伐」結束	《長編》9:212 《遼史》7:86 《續通鑑》5:120	按《遼史》作「冬十月」
開寶元年(月分缺)	黨項首領引北漢軍進攻府州，為守軍擊退	《長編》9:213	

年分	事件	資料來源	備注
開寶二年(969)春正月 壬寅	太祖遣殿中侍御史李瑩等十八人分往諸州，調發軍儲至太原，準備發動第二次「北伐」	《長編》10：216 《統類》2：2、30-31 《續通鑑》5：121	按《統類》卷二作「開寶三年」恐誤，但同卷卻作「開寶二年」
開寶二年二月戊午	下詔親征	《長編》10：216 《宋史》2：28	
開寶二年三月癸卯	北漢憲州判官史昭文以城來降	《宋史》1：28 《續通鑑》5：124	
開寶二年夏四月(丙子)	北漢麟州刺史結齊羅、兵馬都監嘉且舍鄂以城來降	《長編》10：221	
開寶二年閏五月壬子	久攻太原未下，第二次「北伐」結束	《長編》10：224-25	
開寶二年閏五月己未	徙太原民數萬家於山東、河南	《長編》10：225	
開寶二年六月(癸巳)	安置所徙之太原民，每人帛一匹	《長編》10：227	
開寶三年(970)六月己亥	命河東北、陝西諸州軍遣人入北漢境，招降其吏民	《長編》11：247	
開寶三年十一月(丙寅)	北漢軍校王興等二十三人來降	《長編》11：253	
開寶四年(971)六月(壬午)	嵐州言敗北漢軍於古冶(台)村，斬首數百級	《長編》12：267 《續通鑑》6：152	按《續通鑑》作「古台村」
開寶四年七月(癸亥)	平晉軍使王懷美領軍破北漢孟園、樂義二寨	《長編》12：270 《續通鑑》6：154	
開寶五年(972)春正月(壬寅)	北漢進攻方山、雅爾兩寨，為守軍擊退	《長編》13：279	
開寶五年三月乙亥	遼州招收指揮使王滿領軍入北漢界，拔其一寨	《長編》13：282	

年分	事件	資料來源	備注
開寶五年夏四月(丙午)	隰州團練使兼晉隰等州沿邊都巡檢使周勳築壘北漢界上，為北漢軍襲破	《長編》13：283 《續通鑑》7：162	
開寶五年十二月(乙卯)	乾寧軍言北漢民二千二百四十八戶來歸	《長編》13：292	
開寶六年(973)六月癸巳	隰州巡檢使李謙溥領軍入太原，連拔七寨	《長編》14：302 《宋史》3：40； 《宋史》273：9339	
開寶七年(974)十二月庚午	北漢遣代州刺史蔚進進攻平陽，為權知晉州武守琦領軍敗其軍五千於洪洞縣界。	《長編》15：329 《續通鑑》8：186	
開寶八年(975)三月己亥	知潞州藥繼能攻取北漢鷹堡寨	《宋史》3：44	
開寶九年(976)五月(甲申)	晉州俘獲北漢嵐、憲、石三州巡檢使王洪武等三十九人	《長編》17：372 《宋史》3：47	
開寶九年八月丁未	太祖開始發動第三次「北伐」	《長編》17：374	
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	太祖卒，第三次「北伐」隨即結束	《長編》17：380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First the South, Later the North”: The Only Strategy of the Song Unification Campaign (960–976)?

(A Summary)

Leung Wai Kei

At the time of its found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北宋 (960–1127) only controlled the territory of the Later Zhou 後周 (951–960), traditionally known as the “Zhong Yuan” region 中原地區. There were still several neighbouring local kingdoms, including the Southern Tang 南唐 (937–975), the Later Shu 後蜀 (934–965), and the Northern Han 北漢 (951–979). Moreover, serious threat was imposed by the Khitan 契丹 that found the Liao dynasty 遼朝 and gave support to the Northern Ha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Song faced several potential enemies. In order to put an end to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五代十國, Emperor Taizu 太祖 (960–976), founder of the Northern Song, inherited the policy of Zhou Shizong 周世宗 (r. 954–959) — to unify China and reestablish centralized rule, like the previous Tang dynasty 唐朝. He needed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attain his goal. Many scholars, especially those in mainland China, have identified the strategy of the Song unification campaign as “First the South, Later the North” (先南征，後北伐).

However, the author considers such interpretation highly dubious. The present essay has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 textual examination on the exact year of the event “*xueye fang Pu*” 雪夜訪普 (Taizu’s visit and consultation with Zhao Pu 趙普 at the snowing night), commonly recognized as having a decisive role in the making of strategy for the unification campaign. The author establishes that the year of Taizu’s consultation with Zhao Pu was A.D. 965, while the war of unification began in A.D. 963, two years before the eventful meeting. Therefore, the author consider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vent overrated and Zhao Pu’s role in the making of the strategy is questionable. The second part evaluates the opinion of traditional scholars who concurred that there was an unified stance among Taizu, Zhao Pu and other imperial advisors. They assumed that Taizu always accepted their advice. However, in fact, Taizu waged two northern expeditions attacking the Northern Han, before the entire destruction of the local kingdoms in the south. He had proposed “First the North, Later the South,” and it fully ran counter to the sequence of the strategy of the unification campaign suggested by Zhao Pu. The third part of the paper attempts to trace the genesis of Taizu’s strategy from its historical origin and geostrategic background.

Finall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early Song’s strategy is not “First the South, Later the North,” but “First the North, Later the South.”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